

ZHONGGUO ZHENGZHI FAZHAN FANSHI DE XUANZE

中国政治发展范式的选择

史卫民 张小兵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ONGGUO ZHENGZHI FAZHAN FANSHI DE XUANZE

中国政治发展范式的选择

史卫民 张小兵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政治发展范式的选择 / 史卫民, 张小兵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 - 7 - 5161 - 3316 - 3

I. ①中… II. ①史…②张…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中国
IV. ①D6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939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郭沂涟
责任校对 李小冰
责任印制 张汉林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75
插 页 2
字 数 217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言	如何看待“中国发展道路”	(1)
第一章	可供选择的政治发展范式	(4)
一	政治发展涉及的多种因素	(4)
二	基于主导性因素的不同政治发展范式	(6)
三	民众对影响国家发展因素的看法	(8)
第二章	“经济决定论”与“经济诱导型”范式	(10)
一	“经济决定论”政治发展范式的理论解释	(10)
二	“经济诱导型”政治发展范式涉及的理论问题	(12)
三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认识	(14)
四	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可复制性”	(18)
五	政策的关键性作用	(19)
六	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关的政治发展范式选择	(21)
第三章	“制度化”范式	(25)
一	“制度化”政治发展范式的理论依据	(25)
二	“威权体制转型”与“政治体制改革”	(27)
三	中国制度体系的三个“不变”	(30)
四	“政府转型”体现的中国制度体系的调适性	(33)
五	制度变化的政策诱因	(37)
六	中国未选择“制度化”范式的理由	(39)

第四章 “民主化”范式	(43)
一 对民主与“民主化”的理解	(43)
二 改革开放以来的“选举民主”	(46)
三 “组织型民主”的发展	(48)
四 “协商民主”的扩展	(50)
五 对“网络民主”的不同看法	(52)
六 “充权民主”的重要性	(53)
七 中国“民主化”的三种思路	(55)
第五章 “法治化”范式	(59)
一 法律与法治	(59)
二 当代中国的宪政诉求	(61)
三 “先政策,后法律”的经验模式	(63)
四 “依法治国”与“文件治国”的关系	(65)
五 作为努力方向的“法治化”范式	(66)
第六章 “文化决定论”范式	(68)
一 研究政治文化的意义	(68)
二 百年来的中国“文化转型”	(69)
三 “两个不彻底”带来的问题	(77)
四 五种文化范式的选择	(79)
五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矛盾性及政策的影响	(82)
第七章 “公民社会”范式	(85)
一 “公民社会”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	(85)
二 公民权利保障:社会转型的基础	(87)
三 多种形式的公民参与:社会转型的动力	(88)
四 与政府合作的社会组织:社会转型的重要载体	(89)
五 臣民向公民的转换:社会转型的表征	(92)
六 发展“公民的社会”:社会转型的阶段性目标	(94)
七 “公民社会”范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96)
八 政策对社会转型的影响	(100)

第八章 “社会冲突”范式	(103)
一 社会冲突研究的几个重要理论视角	(103)
二 反映认同与危机关系的政治发展范式	(105)
三 当代中国社会不同种类的冲突	(110)
四 “积极冲突”与“消极冲突”	(114)
五 中国社会需要的七种安全	(115)
六 注重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118)
七 社会冲突影响政治发展的基本认识	(121)
 第九章 “全球化”范式	(124)
一 政治发展的外力影响	(124)
二 “全球化”理论对中国的影响	(125)
三 “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128)
四 国际压力下的中国发展道路选择	(130)
五 应对国际压力的政策范式	(134)
 第十章 政党与政策	(136)
一 “政策”与“公共政策”	(136)
二 公共政策的分类	(138)
三 政策在政治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	(141)
四 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政策主导权	(143)
五 中国共产党决策理念的转变	(148)
六 自觉意识与精英体制	(150)
七 政策的“合法性”和“认授性”	(153)
 第十一章 “政策主导”范式	(157)
一 中国民众的“政策依赖性”	(157)
二 “政策主导”政治发展范式	(163)
三 “政策主导”政治发展范式与其他范式的不同	(167)
四 “政策主导”政治发展范式的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	(170)
五 维系“政策主导”政治发展范式的重要条件	(174)

第十二章 “政策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	(177)
一 “政策民主”的基本定义	(177)
二 “政策民主”与“选举民主”之间的优先选择	(180)
三 中国政策模式的基本特征	(182)
四 中国公民的政策参与	(185)
五 “政策民主”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	(187)
 主要参考书目	 (193)

导言 如何看待“中国发展道路”

在2012年的全国性“中国公民政治文化”问卷调查中，曾向被调查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是否同意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经找到了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在做出有效选择的6158名被调查者中，164人选择“非常不同意”，占2.66%；525人选择“不太同意”，占8.53%；1813人选择“不确定”，占29.44%；2521人选择“比较同意”，占40.94%；1135人选择“非常同意”，占18.43%。从选择情况看，59.37%的被调查者对于“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经找到了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持的是基本肯定态度，11.19%的被调查者持的是基本否定态度，29.44%的被调查者持的是不确定态度。^①这样的调查结果，代表的应是一般民众的看法，显示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上，还没有形成“一边倒”的共识，因为毕竟有略高于40%的人抱的是质疑和不确定态度。

学者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看法也是有分歧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态度。第一类是认为中国经过多年的摸索，已经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甚至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第二类是认为中国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且有了一定的收获，但是还难以说已经找到了这样一条道路，更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第三类是认为中国在某些方面已经找到了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或模式，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已经摸索出了一条道路，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在其他方面还在继续摸索；作为一个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完整的“中国发展道路”是否已经成为现实，还不是很确定。

^① 见《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版，第16页。

在这三类态度中，第二类和第三类比较接近，都对已经形成“中国发展道路”持怀疑态度，但第三类态度显然比第二类积极一些，至少不否定局部的道路选择已经形成。

中国共产党已对中国发展道路有全面的解释，如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不仅强调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还对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以下定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的解释显然是在宣示一个远大的目标或未来努力的方向，在同一份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要求进行改革开放的探索，并且没有提及“中国模式”，至少表明在这一问题上还有一定的保留，重点还是要继续摸索如何“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

对于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民众同样有深刻的体会。以中国的几项重要“建设”为例，可以看出普通民众眼中的发展“不平衡”是什么样的状态。2011年全国性的“中国公民政策参与”问卷调查要求被调查者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五大建设”（这“五大建设”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倡导的内容）的满意度打分（每项建设的分值均为5分），得分最高的是经济建设（3.68分），其次是社会建设（3.67分），再次是文化建设（3.61分），第四是政治建设（3.58分），得分最低的是生态建设（3.49分）。^①2012年的全国性“中国公民政治文化”问卷调查将“五大建设”增加为“六大建设”（增加了“党的建设”），请被调查者选出最满意的一种建设。调查结果显示，满意“经济建设”的被调查者最多，占35.62%；其次是“党的建设”，占21.08%；再次是“社会建设”，占16.72%；第四是“文化建设”，占12.01%；第五是“生态建设”，占10.30%；满意“政治建设”

^① 见史卫民、郑建君、李国强、涂锋《中国公民政策参与研究：基于2011年全国问卷调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3月版，第151—152页。

的被调查者最少，只占 4.27%。^① 除去“党的建设”，两次调查反映的基本状况应该是一致的，即民众满意程度比较高的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满意程度比较低的是生态建设和政治建设。换言之，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发展速度较快，文化建设、生态建设、政治建设的发展速度相对较慢，民众对各种“建设”满意程度的高低，正是发展不平衡的一种真实反映。

“发展不平衡”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继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结果，“发展不平衡”可以揭示一个重要的发展“秘密”，即中国采用的应是“选择性”发展的策略，具体而言首先选择的是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开始注重社会发展，然后循序渐进地关注文化发展、生态发展乃至政治发展等。那么这样的“选择”是如何作出的，或者进一步说，这样的“选择”是否与中国政治发展的“范式选择”有关，这正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应该承认，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是面临“发展困局”时，需要进行重要的选择，并且很可能是在多种发展范式中作出自己的抉择，这样的抉择既可能涉及经济发展范式、社会发展范式、文化发展范式，也可能涉及政治发展范式。本书虽然主要讨论政治发展范式的选择，但也会涉及其他发展范式的选择问题，主要是希望用较广泛的视角，将读者带入“发展研究”涉猎的多种问题的讨论中，共同探讨中国人是如何为自己作出了重大的选择，这样的选择又如何影响着所有的中国人。

^① 《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报告（2013）》，第 17 页。

第一章 可供选择的政治发展范式

如果说经济发展需要在“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发展范式中进行选择，社会发展需要在“福利国家”、“公民社会”等发展范式中进行选择，那么政治发展同样需要在一些不同的发展范式中进行选择，因此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哪些主要的政治发展范式可以供中国人选择。

一 政治发展涉及的多种因素

“政治发展”是20世纪50年代由西方学者提出来的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定义，无论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有不同的解释。美国学者派伊（Lucian W. Pye，又译白鲁恂）就曾归纳出西方学术界对“政治发展”的10种不同定义：（1）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2）政治发展是工业社会的典型政治形态。（3）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4）政治发展是民族国家的运转。（5）政治发展是行政和法律的发展。（6）政治发展是大众动员和大众参与。（7）政治发展是民主制度的建立。（8）政治发展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变迁。（9）政治发展是动员和权力。（10）政治发展是多元社会变迁进程的一个方面。^①

“政治发展”的定义不同，可能使研究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政治发展作为一种综合性研究，应用政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各种可能的研究

^① [美] 鲁恂·W. 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任晓、王元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49—62页。

途径和方法,解释和说明政治体系变化的方向和条件,^①应该是相同的。对某一国家的政治发展,既可以是“描述性”的研究,把政治发展理解为一个单一的或一组过程,着重于过程的探讨;也可以是“目标性”的研究,将政治发展设想为达到某个目标的运动,着重于目标的探讨。^②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哪一种研究,都会涉及影响政治发展过程或者达到政治发展目标的多种因素而不是单一因素。派伊列出的政治发展的10种不同定义,实际上显示的就是对不同因素的侧重:第一种定义重在解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条件,侧重的应是政策因素;第二种定义假定工业生活产生了一种具有很大共性和普遍意义的政治生活类型,侧重的是经济因素;第三种定义以发达工业国家为社会与经济生活方面的旗手和标兵,侧重的是国际因素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影响因素;第四种定义认为政治发展是在国家制度范围内的民族主义的政治,侧重的是政治文化因素;第五种定义认为行政发展是与合理性的传播、世俗法律概念的加强以及促进人类事物的技术和专门知识的提高并驾齐驱的,侧重的是制度和法治因素;第六种定义重点关注公民的角色定位以及新的忠诚与参与标准,侧重的是公民社会因素;第七种定义假设名副其实的政治发展的唯一方式就是民主政治的建立,侧重的是民主因素;第八种定义把注意力集中在以有目的和有序的变迁能力为基础的政治稳定的概念上,侧重的是社会冲突因素;第九种定义认为可以按照体系所能动员起来的绝对权力的水平和程度来衡量一个政治体系,侧重的是体系或制度因素;第十种定义认为持续不断的政治发展只能是在一个社会变迁多元过程的背景前提下进行,其中任何社会部分和方面都不能长期落后,侧重的是社会因素。^③

参照派伊对政治发展定义的归纳,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可能主要需要注意十一个因素所起的作用。这十一个因素应该是经济因素、制度因素、民主因素、法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冲突因素、国际因素、政党因素、政策因素、发展方式因素。^④

① 燕继荣主编:《发展政治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② 同上书,第39页。

③ [美]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第49—62页。

④ 对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已有一些具体的研究,史卫民:《“政策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

二 基于主导性因素的不同政治发展范式

尽管影响政治发展的是多种因素而不是单一因素，但以某种因素作为主导性因素，可以产生不同的政治发展范式。所谓“主导性因素”，就是某种因素如果作为核心因素，对发展能够起到决定性和方向性的作用，影响或制约其他因素，并构成一种独特的政治发展范式。依据“主导性因素”的不同，上文提到的十一个因素，可能产生十一种政治发展范式。

(1) “经济决定论”范式或“经济诱导型”范式。以“经济因素”作为政治发展的主导性因素，重点讨论的可能不是政治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条件或者政治发展能否带来经济发展等问题，而是突出强调“经济至上”或者“经济引领政治”的发展范式。

(2) “制度化”范式。制度变化是政治体系变化的重要指标，并且可能涉及国家政权的变化，也可能涉及政治制度或政治体制的变化，但关键性的问题是如果以“制度因素”作为政治发展的主导性因素，所带来的发展范式往往要以牺牲既有的制度形态作为必要的代价。

(3) “民主化”范式。民主既可以作为政治发展的内容，也可以作为政治发展的方向或目标；尤其是将“民主因素”作为政治发展的主导性因素，所带来的发展范式一定是带有前提性的，即发展什么样的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还是发展其他民主。

(4) “法治化”范式。以“法治因素”作为政治发展的主导性因素，不仅涉及政治与法律或行政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将“人治”变为“法治”的问题，还需要在相应的发展范式中対是否发展宪政给出明确的回答。

(5) “文化决定论”范式。政治发展不是泛泛的关注政治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而是有针对性地对政治文化展开研究，主要涉及政治发展的价值判断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取向、政治观念、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认识等问题，以及因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政治文化发展与变化等问题。强调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的主导性作用，既可能导出“传统文化型”或“意识形态型”的发展范式，也可能导出“多元文化型”或“网络文化型”等发展范式。

(6) “公民社会”范式。社会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发展研究中不可缺少

的内容，不仅涉及政治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基础以及政治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变化等重大问题，还会涉及利益多元性、社会组织发展、公民平等和自由、公民权利保障、公民政治理性等具体问题。但是以“社会因素”作为主导性因素，与之相应的政治发展范式强调的往往是公民社会的发展范式。

(7) “社会冲突”范式。各种形式的冲突，可能改变既有的政治秩序，影响政治稳定，甚至出现政治危机，因此“冲突”成为政治发展不能不认真关注的问题，并且需要对政治稳定状态下的政治发展范式和政治危机下的政治发展范式等作出不同的解释。

(8) “全球化”范式。一国的政治发展，既有国内因素的影响，也有国际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民主化”的进程中，不仅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起了重要的“推手”和“标杆”作用，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直接植入某种政治发展范式。对于强调“走自己路”的国家，往往会十分警惕，希望这样的植入不会在本国发生。

(9) “威权性政党”范式。不同的政党政治带来的是不同的政治发展范式，尤其是将共产党与“威权性政党”联系在一起，已经被描绘为以“党国体制”为特征的政治发展范式。这样的描绘不一定都带有贬义，并且应该注意的恰是“政党因素”对政治发展的主导性作用。

(10) “政策主导”范式。政策是政治运行的重要载体，政策的好坏以及政策执行的效力和效率，在一定意义上代表政治发展水平的高低，所以研究政治发展不能不高度重视政策问题。以“政策因素”作为主导性因素，彰显的应是政策决定发展的关系，与之相应的发展范式不仅涉及政策过程本身，亦涉及因政策变化带来的一系列变化。

(11) “激进”或“渐进”范式。以“发展方式因素”作为主导性因素，需要在革命、改革、改良等方式中进行选择，并且会产生相应的“激进”、“渐进”甚至“倒退”等范式。

这十一种政治发展范式应该是可供中国选择的主要范式，我们并不否认还有其他政治发展范式，如“宗教化”范式、“乌托邦”范式、“极权主义”范式等，但是这些范式显然不适应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因此不用做更多的讨论。我们也不否认在这十一种发展范式中，有的范式可以与其他范式合并，我们也会做这样的合并，当然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合

并是比较合理的，并且有助于对政治发展范式选择的解释。

三 民众对影响国家发展因素的看法

中国的普通民众如何看待影响发展的各种因素，对政治发展范式的解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2011年进行的全国性“中国公民政策参与问卷调查”中，设计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的问题，并给出了八个选项，请受访者选择三项并根据选项的重要性排序。这八个选项实际涉及了可能影响中国发展的八个因素：（1）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制度因素；（2）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有了较大发展——民主因素；（3）中国走上了依法治国的道路——法治因素；（4）中国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文化因素；（5）中国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因素；（6）中国的社会冲突导致变革——社会冲突因素；（7）中国的成就是国际压力和全球化影响的结果——国际因素；（8）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采用了符合民意和适合中国发展的政策——政策因素。

问卷调查之所以选择制度、民主、法治、文化、公民社会、社会冲突、国际影响、政策八个因素，而没有涉及经济、政党、发展方式三个因素，主要出于以下的考虑：一是国家发展当然要涉及经济问题，不能不考虑经济因素，但问卷调查之所以不把经济因素放进去，是因为经济快速发展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一项“重要成就”或者是一种“结果”，需要解释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而不是经济与发展的关系。二是国家发展必然会涉及“政党因素”，但“政党因素”与制度等八个因素应该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既可以将“政党因素”看作是一种“统领性”的要素（尤其是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中，政党的“统领性”极强），也可以将“政党因素”看作是一种“内在性”要素，分植在影响国家发展的各因素之内；因此在问卷调查中并没有专门列出“政党因素”，只是在政策因素中突出了政党的位置。三是国家发展与发展方式有密切的关系，但发展方式与制度等八个因素也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八个因素相结合产生的结果，所以在问卷中没有将“选择了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列为选项。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影响中国发展因素的看法，按第一选择由高

到低进行排序，排在第一位的是“制度因素”（43.16%），排在第二位的是“法治因素”（17.62%），排在第三位的是“政策因素”（11.12%），排在第四位的是“民主因素”（11.07%），排在第五位的是“公民社会因素”（5.98%），排在第六位的是“国际影响因素”（4.25%），排在第七位的是“文化因素”（4.22%），排在末位的是“社会冲突因素”（2.58%）。受访者的总提及频率（各因素在三个选项中的选择频率）排序与第一选择相同。在列出的八个因素中，提及频率最高的是“制度因素”（20.31%），其次是“法治因素”（19.21%），再次是“政策因素”（15.37%），第四是“民主因素”（14.35%），第五是“公民社会因素”（11.07%），第六是“国际影响因素”（7.64%），第七是“文化因素”（7.20%），提及频率最低的是“社会冲突因素”（4.85%）。^①

也就是说，在普通民众看来，制度因素、法治因素、政策因素、民主因素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要高于公民社会因素、国际影响因素、文化因素和社会冲突因素。这样的看法是否会影响中国政治发展范式的选择，在后面的各章我们将作出具体的解释。

^① 见史卫民、郑建君、李国强、涂锋《中国公民政策参与研究：基于2011年全国问卷调查数据》，第36—39页。

第二章 “经济决定论”与“经济诱导型”范式

“经济因素”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既可以被解释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也可以被解释为只具有诱导性或诱发性的作用。对“经济因素”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不同，与之相应的政治发展范式也会有所不同。

一 “经济决定论”政治发展范式的理论解释

以“经济因素”作为影响政治发展的决定性或主导性因素，或认为政治发展最终都是由经济发展决定和推动的，注重的是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等，既强调经济发展对政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也强调政治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经济发展服务，不仅要求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与经济发展的方向相一致，还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都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可能。^①

着重以“经济因素”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的，已经出现一些有代表性的看法。如在近年兴起的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已有中国学者提出了以下基本看法：一是“中国模式”的形成既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国情和历史阶段的要求。二是中国模式包括了经济改革模式、逐步融入经济全球

^① 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26—535页。